

供应课程终于开课了。把燃气供应作为土木系的一门专业课程，全面系统地开课也是先例了。很多人都来旁听课程。而我也

就不再教暖通课程，改为研究供热供燃气方面的教师。

(转自《暖通空调在线》，董丽萍整理)

感念清华

○陈为邦（1963 土建）

考入清华和《我的母亲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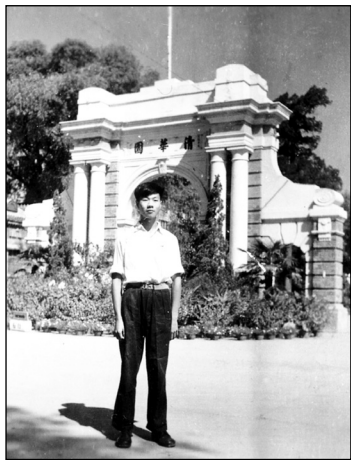
1957 年全国高考的作文题目是《我的母亲》。因为这个题目，让我考得比较顺利。

1949 年夏天在重庆，小学暑假刚刚开始，我就得了伤寒，这个病是要命的。在医院确诊并初步治疗后，父亲很担心，母亲则坚持在家里亲自看护。因为听说不少这种病人在住院恢复时期，实在忍受不了饥饿，因偷吃东西而肠道大出血死亡。这样，母亲在家异常细致地护理我。那年夏天重庆特别热，为了降低室内温度，家

里买来一些冰块，放在我房间。前后四十多天，我终于康复，本来就消瘦的母亲更消瘦了。这一段刻骨铭心的母爱，在中学作文时，我写了出来，由于是真情实感的表达，得到语文老师的特别夸奖，在评语中竟然用了“炉火纯青”的文字。

高考时又见这题，我立刻决定把这篇作文用上，小有调整，就一气呵成，时间不到就交了卷。第一场考试成功，奠定了后来的顺利，心情几乎像做作业一样的平静，超常发挥。加试美术那天，上午画静物，下午是城市景观的想象画，我都顺利完成。回家后母亲问我如何？我说清华问题不大。她提醒我要有多种思想准备。当接到清华的录取通知书时，父母的那份高兴和欣慰，是我一生最美好的记忆。

我的母亲没有上过大学，可学历不高文化高，对世事很有主见。她为人正直，待人宽厚，相夫教子，自有方略。对我们兄弟三人从不说教，我们学业都好。邻居们问她是怎么教育的？她笑答，靠他们自己。她身体不好，我大学六年，母亲担心我学业繁重，怕身体吃不消，总是要我注意健康。为了我们三兄弟上学，家里省吃俭用，尤其在“三年困难”时期，母亲身体更差。1963 年，我顺利毕业了。1964



陈为邦学长在清华读书时留影

年7月，正在大庆油田劳动时，接到电报：母病危，速归。我赶回重庆不几天，她就因癌症去世了。那年她才50岁，走得太早了！

最美好的时光

在清华的六年大学生活，是我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。可以说，是在中国最好的大学，有最好的老师和同学，有最好的学习环境，一切都是最好的。

清华的教学精神突出认真和严谨，突出打好基本功。我的数理化成绩不是很好，所以，在第一二年，学习还是比较艰苦的，高等数学就比较吃力。但是，因为看曹禺的《雷雨》剧本，实在放不下，耽误了复习，高等数学有一次只考了3分。建筑学也是基础难，“建筑初步”，用鸭嘴笔，画各种线条，画西方古典柱式，老是不行，掉墨点，用刀片刮，效果不好。有些同学画得又快又好，真羡慕他们。还有渲染图，慢功细活，心安静不下来，学得吃力。当专业课程展开后，自己觉得比较适应了。可是，和来自北京上海等地的同学比较，我这个内地学生在成绩和天份上仍然相差不少，比如设计效果图，不理想，总不如有些同学画得那么“帅”，自己只能多下笨功夫了。

梁思成先生讲中国建筑风格最难忘。他身材不高，着西服，用粉笔在黑板上画出东西方不同的刀和建筑，那线条真美！从东西方的文化不同讲到建筑的不同，非常有趣而深刻。后来我对城市规划产生了兴趣，毕业前报考了城市规划的研究生。古文翻译根本不行，没有考上。我考不上，正常；但是，真不知何故，我们班一些成

绩很优秀的同学考研，也没有一个被录取。

清华的学生生活丰富多彩。一进校，我就被军乐队紧紧吸引住了，现场听军乐演奏那个美妙，简直不可言表。第二学期我才被允许参加，学铜管，次中音，周乃森先生教。暑假前组织去上海演出，和我们水彩实习冲突，我就没有去。学校让文工团和运动队的同学集中住，这样，我就和其他系的不少队友熟悉起来，认识了更多同学。有两年大年初二晚上，我们军乐队去北京市委大楼里伴舞，见世面，很陶醉的。毕业以后还见到军乐队长建二的姜中光，他黑管吹得很好。

系里的老师们实在太好了，他们的辛勤教诲，让我终身难忘。在工作直到退休后，接触比较多的老教授中有吴良镛、朱自炫等。

我们建三是非常有特色的班集体。思想活跃，同学们的个性得到比较好的发展，班干部的水平比较高。全班学习成绩好，尖子多，系里公认。毕业后，大家总体发展都很不错，许多同学成为单位的骨干，为国家做出了贡献，还出了大师和院士，有的得了“梁思成奖”。

从事城市规划工作

1963年秋天，毕业分配到国家的城市规划研究院工作。我是待分配的，因为那年河北发大水，一段时间京广铁路段不通，回到北京已经是9月了。我赶到三里河国家计委人事处去报到，当时这个院由计委领导。处里同志安排我去阜外大街拐角的大楼上班。从院办公楼正好看见阜成门，非常美。一次下雪天，我很快画了一幅水彩，没有想到，这竟然成了“它”的“纪

□ 我与清华

念照”了。这么多年，我画得很少，这幅画我一直保存了下来。

我是满怀憧憬去做城市规划工作的，可后来才知道，那时国家对城市规划是“不搞”和“下马”的政策。我被分配在综合研究室建筑一组，沈庄同学在建筑二组，周干峙是组长。周后来是建设部副部长，长期领导我的工作。1964年夏天，接到通知，城市规划研究院被撤销，我被调到国家经委施工局工作。不到三年，我就真被“不搞”了。

重新回到规划界，那已经是1979年了。那时，在国家建委下面成立了国家城市建设总局，下设城市规划局，我到这里上班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，1985年，国家实行干部革命化、年轻化、专业化，那年我46岁，年龄条件好，赶上了这个机遇，在建设部城市规划局从副处长提升为副局长。过一年，上了中央党校。学习结束后调动工作到中国城乡建设经济研究所。后来又回到部机关，担任体改法规司的副司长、司长。1996年，担任建设部的总规划师，直到1999年末正式退休。

政策研究、“文字建筑”和“扯皮”

十年动乱，机关大多数同志下放到“五七干校”去了。我被留在了机关，在当时的国家建委业务组，开始接触国家基本建设的全局。工作是从参加“文件生产”起步的。政策研究室的老同志成为我的老师。开会，文件工作最锻炼人，会议简报要求准确、迅速、简练，不能有多余的文字。文件大一些，要求准确、全面、简练。我注意从被修改回来的稿子中学习。后来，自己发表文章，开始是在1973年6月16

日，在《人民日报》上刊出了《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》。这是我国环境保护方面比较早期的文章。1979年，到城市建设总局后，在《经济研究》上发表了《加强城市建设的几个问题》。领导上鼓励，我就大胆起来，结合工作，一直坚持写。2003年，在“非典”时期，我整理编辑了工作以来的主要文章，加上自己的评议，共55万字，以《城市探索——陈为邦城市论述》出版。

当然，政策研究不只是文件制造，更不只是写文章，政策研究是对改革开放在有关领域重大问题上政策的探索。在工作中，我深感传统计划经济条件下对建设的分类存在许多问题。比如，传统分类中，城市的市政公用基础设施被列为非生产性建设。在那种“先生产，后生活”的大原则下，生产性建设是优先安排的，而非生产性建设，总是排在后面的。当压缩建设规模时，则往往是非生产性建设被排在前面。反复思考后，我提出城市市政公用基础设施不是非生产性建设的观点，在《世界经济导报》上发表。没有想到，在基本建设领域还产生了一点影响。在今天看来，实在不是什么事，但在当时，还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

组织传记编写和指导专业志书

由于身体健康原因，我主动提出，并经领导同意，一度去了部的干部学院，后又担任过司的巡视员。工作轻松一些，可事情仍然不少。比如，部领导让我组织编写《党史人物传》，这是中央有关方面下达的任务。具体是三个人的传记：刘秀峰、刘裕民和梁思成。

部里成立了一个“建设系统专业志编纂指导委员会”，主要任务是指导地方城市的有关工作。袁镜身同志是主任，建筑方面有王弗、杨永生，村镇规划建设方面有查家德。城市规划建设方面原来没有人，袁院长就找我去参加。工作比较宽松，没有硬指标，又有文化内涵，大家合作愉快。

后来，袁院长有一次突然问我，是否可以到部的建筑设计院工作，院里面缺少干部。我立刻推辞了，我说，完全没有这方面的经验，不合适。他问我，有什么人可以？我推荐了刘洵蕃同学。我说，刘是我们班的党支部书记，从东北设计院到中国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，又到部机关的房地产业司担任过领导，工作能力强，政策水平高，是理想的人选。后来，刘到设计院担任了领导。当然，那是部领导层面决定的事情了。

担任建设部总规划师

1996年，侯捷部长找我谈话，让我出任部的总规划师。当时，国家需要直接审批城市总体规划的城市大量增加，部里的任务相应加重，总规划师的职位当时空缺，经有关方面推荐，部领导让我做这个工作。我说，几个老同志比我有经验，他们更合适。侯说，他们年龄大了，你再过两年，年龄也不行的。我看“推”不行，就问行政工作我可以不兼任吗？他说可以。因为部里的总师一般都兼任某个司的司长。这样，我就服从组织安排了。

总师的任务比较杂，面很广，不确定，主要是协助部主管领导工作。比如协助领导召开了一些重要会议，如国务院委托的部际联席会议，审查城市总体规划方案；



陈为邦学长夫妇

研究处理一些规划方面的政策体制问题，等等。我还主持过对济南、青岛和成都等城市的总体规划的评审。

我上任不久，在珠海开过一次会，我在发言中大力提倡开展城市设计。会后，清华学长韩骥（当时他是西安城市规划局局长）写信给我，说了好多鼓励的话，积极支持规划界开展城市设计，并争取和建筑学会共同努力开创新局面。我非常感动，也尽力推动这项工作。2000年，国务院在有关文件中指出：“在城市规划编制和实施过程中，要根据本城市的功能和特点，开展城市设计，把民族传统、地方特色和时代精神有机结合起来，精心塑造富有特色的城市形象。”各个地方工作都有进展。后来，由于种种原因，这项工作开展得并不理想，有待今后努力。

1999年，俞正声部长要求我们编写一本供地方领导干部学习城市规划的教材。我担任主编，和城市规划学会的同志一起，组织专家，较快地编写出版了《城市规划读本》，受到好评，多次再版。

工作中我常常感到知识和能力的不足，总是遇到难题，总是不知道怎么办，

□ 我与清华

总是在学习，这不就是“总”吗？记得在清华上学时，好像有人问，为什么要学六年，一个回答是“培养总建筑师”。大概也是玩笑话了。有时，看到同学们的建筑成就，真是羡慕。这么多年，我没有设计过一栋房屋，真是遗憾。但是，人生道路不同，环境和条件也不同，不能简单比较。这样想，自己就得到些许安慰。

学术研究

我们这样的人，最可怕的是陷入行政而忘了学术。我不仅没有忘记，并且尽力开展了。

谈学术研究，需要讲林志群。他是清华建筑系1948级的毕业生，是学校的高才生。我在规划局时，他是科技局的负责人。林非常用功，在完成行政管理工作的同时，在学术研究方面有突出成就，尤其是住宅和城市发展方面的研究。他的英文好，看了许多国外新资料。有一次他对我说，需要做“两栖动物”，白天做行政，晚上可以做学术研究，把实际和科研结合起来。我很感动，他对我帮助很大，可惜他因病过早去世了。

80年代初，在中国科协于光远同志和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倡导下，团结建设部门、有关大学和科研机构，从1981年开始组织研究城市发展战略思想，到1984年1月成立了中国城市科学研究会，我参与了第一线的工作。吴良镛先生成为研究会的领导，我是干具体工作的，就和他联系多起来。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周林同志，是位刻苦学习的专家，非常注意学习城市规划知识，他对我很亲切，帮助很多。他们让我打开了眼界，开始从

城市规划建设向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哲学发展，感觉天地广阔，过去看得太窄。历史又一次给了我难得的机会，我没有放过。

从新世纪开始，我过上了退休生活。可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和中国城市科学研究所的两个副理事长的工作，一直延续到2010年，七十岁以后才完全没有社会工作。

在中国，作为清华学子，是幸运儿；能够在上世纪50年代下半年到60年代初在清华读建筑学，更是幸运。感激人民，感激清华！

清华圆梦我 我梦在清华

○杨卫 (1978 汽车)

李进民 (1978 汽车)

当年读书来清华，历尽春秋与冬夏，
全国选送工农兵，新型大学一枝花。
学生自知功底薄，基础知识差距大，
急得缺啥就补啥，老师从来不讲价。
实践课程仰着头，一作演算就蔫巴，
单腿前行如跛足，谁人不想大步跨。
先天软肋何所怨，知耻后勇无所怕，
难得尊师班风好，风雨来袭任随它。
理论深邃寻有源，实践真知验疵瑕，
议论偏颇化动力，行胜于言惟可佳。
人民送我上大学，我学知识报国家，
若无半点赤子心，如养逆儿算白搭。
自强不息天行健，日月星辰映彩霞，
厚德载物地势坤，承载万物广博下。
大学之高不在楼，大师济济才可夸，
何时尽揽诺贝尔，我祝清华再言大。